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先秦散文选

罗根泽编 戚法仁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先秦散文选

罗根泽 编

戚法仁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先秦散文选

Xiānqín Sǎnwén Xuǎ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放 164,000 开本 850×1168毫米¹/₃₂ 印张 7 插图 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21,900

书号 10019·883

定价 1.40 元

序言

這裏說的先秦指春秋末至戰國時代，約當公元前五世紀中葉至三世紀中葉。在這以前，不能說沒有散文，但除了幼稚的卜辭而外，出現在當時的只有應用誓誥和極為簡單的記事文與史傳文。到這時，不只史傳文飛躍地發展到相當完美的高度，成為後來的楷模；更重要的還產生了一種政治性、哲學性的雜文——即理論文，也發展到相當完美的高度，也成為後來的楷模。

所以這樣特殊發展的原因，是由於特殊的社會階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條件；同時，所有作家，幾乎無例外地都參加到當時的階級鬥爭中去，把散文作為鬥爭武器，也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如大家所週知，這一特殊的社會階段、特殊的歷史時期是由初期封建社會轉變到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促成並促進這一過渡時期的，不消說是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在初期封建社會裏，一方面是統治農奴的大小領主，一方面是被領主統治的農奴。文化掌握在領主階級的文人——即「王官」手裏。和荀子所指出的「有司」一樣，他們只是「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他們「不知其義」。

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荀子榮辱篇）。因此很少發明發展。到春秋末年，由於領主階級的瓦解崩潰，出身領主階級的文人，才爲了生存生活，不得不被迫地爲非領主階級服務。『史記』曆書就記載着『疇人子弟』、『分散』在『諸夏』或『夷狄』。被後來尊爲聖人的孔子，如他自己所說，也不能不『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篇），不問什麼階級出身，只要『自行束脩以上』，交納學費，他就『未嘗無誨焉』（同上述而篇）。這樣，文化就逐漸轉移到非領主的其他階級。

非領主的其他階級，主要的是新興地主階級和商人，同時富裕的農民也有的能够學到文化。

這些階級的興起以至爭取到學習文化，是經過鬥爭得來的，一經學習了文化，掌握了文化，就必然拿來作爲鬥爭武器。同時原來出身領主階級的文人，也一方面因爲不被繼續作領主的貴族所重視，逐漸接近並依靠新興階級，不可避免地要以新興階級的觀點，批判領主階級；一方面因爲究竟是領主階級出身，歸根結柢還是要維護領主階級利益，維護領主統治制度。他們的鬥爭武器，自然也是文化、文學。這結果，就必然是『處士橫議』，『諸子爭鳴』，催促着文化、文學，特別是便於表達思想的散文，飛躍地發展前進。

首先有意識地用文化、文學進行鬥爭的是孔子（前五五一——前四七九）。他的祖先在宋國世爲大夫，他的父親在魯國也還做過『鄆大夫』。可是到他就已經沒落了。他『少也賤』（論語子罕篇），曾當過管理倉庫的『委吏』，也曾當過管理園圃的『乘田』（孟子萬章篇）。他一方面不滿意領主階級的

『君不君，臣不臣』，一方面又設法延續領主階級的統治。他利用舊史的材料和體裁，纂修了一部『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和舊史都沒有差別；差別在『其義則丘（孔子名）竊取之矣』（孟子離婁篇）；他在裏邊貫串了封建主義的正名主義，批判了領主的僭越或破壞封建制度。

正名主義在『春秋』裏的具體表現在條目提綱的擬訂。就以魯隱公元年發生的一件事做例吧。鄭莊公在名爲『鄆』的地方打敗並趕走了他的弟弟共叔段，孔子寫成『鄭伯克段于鄆』。照『左傳』的解釋：『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自然是在譏貶共叔段的不合封建規範。那末，應當稱爲『鄭人』了，爲什麼又稱『鄭伯』呢？是在『譏失教也』，鄭莊公對弟弟也有『失教』的過錯。本來共叔段『出奔共』，爲什麼不提呢？『難之也』，又揭發鄭莊公對他弟弟的志在必得。

很顯然，這樣就必然要字酌句斟，處處仔細，在方法上提供了嚴詞主義，在作品上完成了謹嚴的風格。史記的作者司馬遷說：『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孔子世家）。古文家韓愈說：『春秋謹嚴』（進學解）。對後人的提煉語言，精簡無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孔子這樣修訂春秋的意圖，當然是希望讀者能依照他擬訂的提綱理解歷史事件。但歷史事件既未具體寫入，讀的人如得不到參考史料，就很難理解。因此引史作傳，成爲讀者共同要求，而『左氏傳』

——即『左傳』，或稱『左氏春秋』，創造性的完成了這一光榮任務，兩千多年來一直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在古典史傳文學範圍內，只有司馬遷的史記，才可以比美。這主要的由於作者不只真實地記述了歷史事實，如司馬遷所指出，還貫串了『刺譏褒貶』的批判精神（十二諸侯年表序），有很高的思

想性。其次如韓愈所指出，『左氏浮夸』（進學解），作者還運用了現實主義的誇飾手法，以豐富生動的語言，描繪了史實發展和人物性格，使讀者百讀不厭。

舊傳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很早就有人懷疑，但迄今還沒有得出共信的結論。春秋絕筆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左傳記載了『獲麟後二十七年』（孔穎達疏）的知伯被殺，因此即使作者確名左丘明，但也決不是『論語』所載與孔子同好惡的那位左丘明。春秋只是簡單的條目，左傳已成爲有筋有肉的優良、優美的傳記文學，這中間一定隔有相當時期。

同樣對作者迄今還沒有得出共信的結論的，還有一部『國語』，舊傳也是左丘明所作。可是自『傅玄、劉炫、啖助、陸淳，皆以爲與左氏文體不類』（姚際恒：古今僞書考），宋人陳振孫更說『必非出一人手也』（直齋書錄解題），清人作『四庫全書提要』也指出事語『有與左氏傳未符者』。現在我們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出左傳依魯君紀年，以魯國作中心；國語則全書二十一卷，魯國僅僅兩卷，晉國倒有九卷，確不會同出一人。

就採用的體裁說，左傳是編年體，國語是國別體；就記載的內容說，左傳偏重事跡，國語偏重言論。言論需要理論的論證，需要形象的表達。國語把春秋時代的論證精詳、形象生動的言論記錄下來，對理論文——特別是對戰國的理論文，有直接的影響。左傳也當然有影響，但就比較間接，它直接影響的是後來的史傳文。

和國語體裁相近的還有一部『戰國策』，簡稱『國策』。舊傳劉向撰，但考查起來，實在原出秦

漢間的剗通〔一〕。裏邊所收大都是戰國時的策士說詞，清人章學誠早已說過了：『其辭敷張而揚厲』，直接引導着『文集』『辭章』的興起〔二〕。不過，它和國語的內容性質不同：那裏的記載言論係依據舊史記錄，這裏的記載言論則依據各家文章。譬如合縱家的領袖蘇秦，據『漢書』藝文志有書三十一篇，連橫家的領袖張儀也有書十篇，當然是國策的資料來源。因此，國語所記載的言論基本上可以認為出編者手筆，國策所記載的言論，則基本上是原來本人的作品。因此，引導着『文集』『辭章』興起的『敷張揚厲』的風格也基本上出於戰國時的策士——即縱橫家。當然，沒有剗通或劉向的記載、整齊和編訂，能否起這樣的巨大作用，也是不可想像的。

縱橫家的所以能作出『敷張揚厲』的作品，決定性的原因由於他們和其他各家不同。其他各家也都是針對着當時的實際情況立論的，但一般都提到理論的高度，對語言文章的要求只是說明理論。縱橫家就不同了，他們提出的方案、方法，更切合實際，可却異常簡單，不是合縱抗秦就是連橫事秦。這對於各國的君王將相說來，都有很大的顧慮，要他們聽從就需要巧譬善喻，敷張揚厲，有極大的說服力和感動力。如衆所週知，縱橫家就是所謂『遊說之士』，東奔西跑，經多見廣，吸收了各地的豐富知識，吸收了各地的生動語言，正可以用來巧譬善喻、敷張揚厲地使他的語言文章有極大的說服力和感動力。其次，他們的遊說諸侯，不論在性質上或傳授上都是繼承了古『行人』的聘問諸侯。『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和小行人，專掌朝覲聘問。『儀禮』有聘禮記篇，強調『辭無常，孫（遜）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三〕知對朝覲聘問的辭令，很早就特別考究。到春秋

時代，由於列國的交往頻繁，這種行人辭令更考究了。如孔子就稱讚鄭國『爲命』的先由『裨諶草創之』，再由『世叔討論之』，再由『行人子羽修飾之』，最後還要由『東里子產潤色之』（論語憲問篇）。王孫圉論楚寶，也特別提到觀射父的『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國語楚語下）因此孔子教弟子，也把『言語』列爲『四科』之一。縱橫家既變化發展地繼承着古行人的事業，當然也就批判吸收地發展了古行人的言語辭令。再其次，其他各家的多采多樣的言論文章，當然也給縱橫家許多啓發和幫助。因此，儘管他們的飛箝掉闔、反覆無常，確是應當受到批判，但他們的『敷張揚厲』的文章及對後來文章的積極影響，却必須予以肯定。

遠在殷商時代就產生的誓誥已經就『事』說理，到孔子作春秋又開始了『史』說理。不過前者只能稱爲應用文，後者只能稱爲史傳文，都不能算作理論文或說理文。理論文或說理文的特質是獨立的說理，雖然有時也引證史事，目的也是在指導行動。理論文或說理文的創始者也是孔子。不過他只開口頭說出了，沒有用筆頭寫出。用筆頭寫出的是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把他的話記錄成冊，就是人所共知的『論語』。拿後世的名詞說來，可以叫做『語錄體』，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獨立說理的理論文的書。孔子對於他所主張的理，一般的只說了『其然』，沒有說『其所以然』，論點很懇切著明，論斷大半沒有列舉。這是因爲站在他前面的既沒有必須攻擊的論敵，跟在他後面的又很少有人和他辯論。他的學生偶爾提出疑問，如子路的懷疑『正名』（論語衛靈公篇），宰我的懷疑『三年之喪』（同上陽

貨篇），但只須訓斥幾句就行了，用不着反覆的論證，因而也沒有反覆的論證。

在孔子以後，首先起來反對孔子的是墨子。他名翟。梁啓超在『墨子學案』考訂他約生於孔子卒（前四七九）後十餘年，約卒於孟子生（前三七二）前十餘年。當時的人對面說他是『賤人』，現在的研究者根據他常稱『農與工肆之人』，斷定是『一種小生產者』。正是基於賤人、小生產者憤恨領主階級的鋪張浪費和殘酷剝削，所以墨子雖『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但『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易也），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不能不從理論上擊破孔子的學說。除了專爲攻擊孔子及其學說而提出的『非儒』，他還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和『非命』，也大半是針對孔子學說而發。只攻擊孔子學說是不行的，他還要建立自己的學說，所以又提出『尚賢』『尚同』『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和前四種互相結合，成爲完整的『墨學十綱領』。

明確的綱領，需要明確的語言文字表達，墨子對學術性、理論性的言談，不再像孔子的隨隨便便，主要的集中在分別講明十綱領和『非儒』。既要『能立』自己的學說，又要『能破』別人的學說，也就不能再像孔子的只有論點，還要有論據。他一方面創造了『考』『原』和『用』的三種論證方法，一方面又發現了類推的武器。前者是考之『先聖大王之事』，原之『衆之耳目之請（情）』，用之『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非命下），從歷史上，從羣衆中，從實際效果上，證成自己的論點。後者像在公輸篇的用揭發『不知類』戰勝了公輸盤，像在非攻上用『竊桃李』的『不義』，證明『攻國』的尤爲不義。

不過，時代的限制，墨子仍然是會說沒有寫，仍然要等待弟子替他記錄。墨子的弟子分爲鄧陵氏、相里氏和相夫氏三派，因此『非儒』和十綱領就都記錄成上、中、下三篇^{〔六〕}。不但墨子的言談較孔子更集中，而且有論據，弟子的記錄，特別是記錄中篇和下篇的兩派，也較孔子的弟子增多演繹和闡發，把語錄體的理論文發展到相當完整的高度。除了『非儒』和十綱領，還有記錄墨子生平言行的貴義、公孟、魯問和公輸四篇，不知出於哪一派。至其餘收在『墨子』書中的文章，當然都是墨家的作品，但和墨子的直接關係很少。

用語錄體發表文章的最後一家是名軻的孟子。史記孟子傳說：『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他自己也參加了，實質已接近直接著作的形式。梁啓超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三七二年，想是依照元明人的說法，元明人還把他的卒年定在公元前二八九年，即周赧王二十六年^{〔七〕}。他比墨子又靠後了幾十年，社會又有了很大的變化，學術文章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首先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如商鞅，已經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按照他的企圖和計劃，進行改革。其他被領主壓迫剝削的階級也日益增強地對領主階級發動攻擊。再加上國與國間的矛盾與依賴，戰爭與聯合，縱橫家也起來活動了，兵家也更佔重要地位。孟子書中就提到『處士橫議』，提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篇），提到非楊非墨的『子莫執中』（盡心篇），提到公孫衍、張儀（滕文公篇）。又曾和縱橫家淳于髡（離婁篇）、墨者夷之（滕文公篇）、神農之言者許行（同上）、主張性惡的告子（告子篇）、主張以利弭兵的宋牼（同上）辯論。史記孟子傳也說：『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

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爲賢。可是孟子是『魯公族孟孫之後』（趙岐『孟子題辭』），要極力維護領主制度。雖然由於時代的推移，他不能再把希望寄託在周天子，由是寄託在齊宣王、梁惠王。已經腐化了的齊宣王、梁惠王及以次的貴族，怎麼能採用他所理想的『保民而王』的『仁政』呢？這結果，就使他能不進行兩方面的理論鬥爭：一方面駁詰各種橫議的處士，一方面遊說各國的君相。如他自己所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篇），確有辯論和遊說的必要。同時各家的辯論遊說，即各處士的橫議，又給予他許多提示和啓示，培養並激發了他的辯論遊說從而寫成文章的能力。他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篇）。從方法到技巧，從論證到聲勢，大大地提高了理論文。如人所共知，對後世起着無比的模範作用。

直接著作，就是不由別人記錄，而由自己寫成的文章，我們可以叫做『著論體』，是老子創始的。由於創始的艱難，老子的著作——即『老子』五千言，和論語一樣，論點是寫出了，論據大半省略。

遠在唐代，韓愈就看出『孔子師老聃』是道家的把戲。實則老聃就是太史儋，他的時代比孔子靠後了近百年的光景。史記老子傳說他是『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苦縣本來是陳國的土地，公元前四七九年，楚滅陳，才被迫地隸屬楚國。老子不在楚國做官，倒跑到周國做柱下史，後來『見周之

衰』，又跑到世爲楚敵的秦國，勸秦獻公做霸王，很可能是亡陳的領主。稍後的道家另一大師莊子，名周，約當公元前三五〇年左右至二七〇年左右。他的祖國在被稱爲『桀宋』的宋君偃——即宋康王統治了四十九年以後，滅於齊、楚、魏三國，時當公元前二八六年。他大約親身經歷了亡國之痛。因此，假如說儒家的孔孟是未落的領主，則道家的老莊是亡國的領主。正因爲是亡國的領主，所以他們一方面批判統治者的荒唐無能，一方面批判大國的攻伐兼併，認爲都不能順應自然，都不知無爲而治，以致搞得天下每大亂。

莊子和孟子同時稍後，散文已有很高的發展，他寫了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和應帝王七篇論文，又寫了一篇批評諸子、介紹自己的自序，因爲開頭有『天下』二字，後人稱爲『天下篇』。他說他的寫文章有三種方法：『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天下篇）。寓言是故事神話，重言是假託有地位、爲人尊信的人的言論，卮言就是浪漫主義的手法。例如『逍遙遊篇』一開始就說：『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是寓言。稍後又說：『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長）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是重言。而這寓言和重言，又都是卮言，都是創造出來用以說理的，不能認爲真的這樣大的鯢鵬，真的湯曾這樣問棘。在那時，別家也都喜歡引

證古人言行，如墨子的『考之先聖大王之事』，就是一個例證。但一般雖有擴大，基本上却是『真人真事』。莊子就不同了，大體都是他的創造，即使真有其人，行事和言論也未必實有。這種創造，不只經過他的概括，而且經過他的誇飾塑造，不論是人物或其他形象，都特別突出的具有典型性格，容易引起注意。動物像鯢鵬自然如此，人物像解牛的庖丁，承蜩的痾僂，亦莫不然。這樣，就使散文在邏輯性、科學性和說服力以外，又增加了故事性、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光輝，他的影響，總的說僅次於孟子，某一方面還超過了孟子。首先學習他的是他的弟子和後學，用他的觀點和方法，寫了很多文章，後人附編在他的文章後面，合爲『莊子』一書〔10〕。

孟莊以後，把理論文發展到內容更充實、組織更嚴密的是晚出的墨家和法家。晚出的墨家的著作，傳下來的有小取、大取、經上下和經說上下六篇。和莊子後學的文章的附編在『莊子』書一樣，這些文章也附編在『墨子』書。可惜後來很少有人閱讀，解釋鑽研是近百年才開始的。經上下是定律，經說上下是說明，同出一人，並不如部分學者根據儒家經傳的推測，認爲經上下作於墨子，經說上下作於墨子的弟子後學。只就表現形式說，這也是很好的一種方法。韓非子說林上下、內儲說上下、外儲說左上下和右上下等篇，就應當是據此發展的。不同的只是『墨子』經說上下是從理論說明，韓非子是借故事說明，因此後者更富有形象性。

晚出墨家所討論的，一般都屬於語言問題和邏輯問題，標誌着語言文學——具體說就是那時的理論散文已發展到成爲科學研究對象。例如那時的各家都常提到『名實』，究竟什麼是名？什麼是實？

名實的關係怎樣？有什麼作用？經上就解答了。它說：『名實合，爲。』經說上解釋說：『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爲也。』翻成現在的話就是：我們說出來的是名，說的對象是實，名實一致是合，否則是不合。弄清這些概念是有實際用處的，可以指導我們的具體『行爲』。又如不論建立自己的學說或批判別人的學說，都需要反覆論證。可是論證的重要方法究竟有哪些？怎樣才不致流於錯誤？小取篇說：『或也者，不盡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爲之法也。……辟（譬）也者，舉也（他）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同之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這就是指出重要的方法有九種。『或』是邏輯上的特稱命題，『假』是假言命題，『效』是據實物找出規律（法），『譬』是借物作喻，『侔』是借辭作比，『援』是引證，『推』是推理，『同』『異』是找出同點和異點。小取篇又說：『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全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這就是說論證不能不依靠譬、侔、援、推。依靠的基礎是由於正待論證的事物與彼有同點。但一則不全同，二則就是同的，原因也不同，因此它的論證作用是有限度的，過了限度就會導致錯誤。很顯然，這些研究成果，反過來又推動了理論散文的進一步向前發展。

法家的出現時代較晚，又代表着在當時最有力量的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更有吸收前人散文成果的

條件，也更有面對當時社會現實的勇氣，從而他們的文章的思想性也就更強，藝術性也就更高。特別是韓非（？——前二三四），在他以前，已有人就春秋時代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的管仲的遺說遺行，寫成被後來編爲『管子』一書的很多文章〔二〕。主張『法治』的商鞅，主張『術治』的申不害，主張『勢治』的慎到，也都有自己或他人代寫的文章。還有他的老師荀子（前三一〇？——前二三八後），雖出於儒家，但已逐漸轉向法家。作『正名』、作『解蔽』，對邏輯學和心理學有很深的研究。他要求：『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情）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名篇）。不消說，這對寫文章有很大關係。和孟子的蓬勃浩瀚不同，荀子的文章異常的謹嚴綿密，連門弟子的記錄在內，傳下來的有三十二篇。因此不論從師傳到家派，從時代成就到階級成就，都替韓非準備了總集大成的條件。再加上他雖然是韓國公子，却是被歧視的『諸公子』，而不是適長公子；他又沒有能和他的同學李斯一樣，得到新興統治者的重用。同時他的祖國又腐敗守舊，軟弱無力，隨時都有被秦吞滅的危險。這就使他更感覺問題嚴重，必須用文章鬥爭。他一方面向秦王呼籲『存韓』（三），一方面又『數以書諫韓王』。秦王不聽是當然的，可惜韓王也不能用。如司馬遷所指出：『於是韓非疾（疾恨）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駕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以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這就是說：在政治經濟上不能採用變法革新的政策，在學術教育上又只知道沿襲着已經空虛浮夸的儒墨（俠）兩家。

韓非的文章是多種多樣的，有一般的著論體，有特殊的經說體，還有他獨創的辯難體。辯難體的一種是先列舉古人的行事和言論，然後設爲『或曰』駁辯古人的錯誤，說出自己的見解，如難一、難二和難三三篇。另一種是在列舉古人事和言論之後，先設『或曰』代表別家的見解辯難，再設『或曰』說出自己的見解，駁辯別家的辯難，如難四和難勢兩篇。自然我們必須指出代表別家的辯難和自己的辯難都標『或曰』，是不够清楚的，很容易造成混亂。但我們也必須指出這種方法是值得批判地吸收的。他的書中還有解老、喻老兩篇，如不是他人的文章竄入，那麼他還創造了注釋的體裁，可能是自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學來的。但公、穀、左傳是在注『事』，這裏是在注『理』，所以仍有創造性，不是單純的模仿。

至於貫串在全書的形象性和感染力，雖沒有莊子那麼活躍燦爛，但較其他各家顯然有所提高；邏輯性和說服力，更絲毫沒有疑問，韓非把它推展到空前的高度。難一和難勢兩篇都設爲出售楯（盾）與矛的方面炫耀『楯之堅，物莫能陷』；一方面又炫耀『矛之利，物無不陷』。然後指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的『不可兩立』。這證明他已發現了矛盾律，並根據矛盾律，論證事理。我們用『矛盾律』三個字譯 Law of Contradiction，當然就是採用的韓非的命名。難勢篇末段指出或者說：『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正同於說：『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不知也有非甜非苦之味。他說這是：『積辯累辭，離理失術』的『兩末之議』。證明他也發現了排中律，並且發現了排中律的局限性和不可機械地採用。在顯學篇，他強調：『無參